

# 乡村建设运动：一个社会学的考察

李善峰

在本世纪的二三十年代，也就是自1926—1937年的十余年间，在我国发生了一场颇有声势的乡村建设运动，一大批自由派知识分子，企图在保存现有社会关系的前提下，用非暴力的方法，通过社会改良，振兴中国农村，刷新中国政治，进而实现社会的现代化。这次活动，既不同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村革命运动，也有别于国民党政府的农村复兴计划，它代表了一部分爱国的知识分子在国难当头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因而在中国从一个封建帝国走向现代国家的过程中，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总结这次活动的经验教训，可以为我们今天正在进行的各项社区工作，对深化农村改革，提供一个独特的观察视角。

## 一、乡村建设运动的概况

本文的乡村建设运动所涉及的范围，起于河北省定县翟城村米迪刚所提倡的农村建设和晏阳初在同一地带所办的平民教育实验，至于1937年因日本大举进攻中国使各项建设事业的被迫中止。在这大约10年的时间里，我国各地出现了一个持续的乡村建设运动的热潮。据美国学者拉穆利（Harry J. Lamley）统计，到1934年，我国各地从事诸种建设活动的公私团体共有691个。<sup>①</sup>台湾社会学家杨懋春教授根据申报年鉴统计，自1925—1934年全国各地兴办的乡村建设、农村改造、民众教育、自治实验等计划共63处。<sup>②</sup>在这为数众多的各项活动中，其中由知识分子主持的、最著名的有三家，即河北定县的平民教育实验区、山东邹平的乡村建设实验、江苏的乡村教育工作，由此形成全国乡建运动的三大中心。

### （一）定县的平民教育运动

河北定县的平民教育运动是由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主持的。1923年8月，晏阳初在北京成立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总会，开始倡导平民教育运动。1924年，促进总会的工作由城市转向农村。1926年正式选定定县为该会的华北实验区（总会把全国分为华南、华北、华东、华西、华中、西北、东北七个平民教育区），以定县翟城村为中心，集中力量，从事以县为单位的乡村平民教育运动。

定县在河北省西部，当时人口40万，472村，共7万户。全县地势平坦，土质中常，从事农业者占90%，自耕中农约为60%，佃农约10%，拥有耕地20—30亩的农民为多，贫富悬殊不大，可称为典型的农村社会。<sup>③</sup>定县之所以被选为实验县，是因为“定县的农民生活，乡村组织，农业的情形，都可以相当的代表全国各县。定县距离都市较远，人民生活未受都市

<sup>①</sup> Harry J. Lamley: "Liang Shu-ming, Rural Reconstruction, and Rural Work Discussion Society, 1933—1935" Chung Chi Journal Vol.8, No. 2, Mag 1969, P.60. Note 13, P.53.

<sup>②</sup> 杨懋春：《近代中国农村社会之演变》，台湾远流图书公司，1984年版，第107页。

<sup>③</sup> 《全国乡村建设运动概况》（第一辑上册），第332页。

的特殊影响，交通上有平汉铁路的便利，比较合适的做县单位的实验”。<sup>①</sup>

平教会在进行了一段识字运动后，觉得仅教农民识得文字，取得求知识的工具对于农民是没有直接效应的。实际工作使他们觉悟到，在乡村办教育，若不参与建设工作，是没有用的。“不谋建设的教育，是会落空的，是无补于目前的中国农村社会的。”<sup>②</sup>因此，他们逐渐放弃单纯的识字运动的主张，而谋求整个的乡村建设。并把宣传口号由“除文盲，做新民”改为“农村改造，民族复兴”。

1930年，平教会经过详细的调查，深切地感到中国人的生活，有四种基本缺点，一是愚；二是穷；三是弱；四是私。“所谓愚，我们知道中国最大多数的农民，不但缺乏知识，简直他们自不识了。所谓穷，我们知道最大多数人民的生活，简直是在生与死的夹缝里挣扎着，实在谈不到什么生活程度。所谓弱，我们知道中国最大多数人民无庸讳辩的是病夫，人民生活的存亡，简直付之天命，所谓科学治疗，公共卫生，根本谈不到。所谓私，我们知道中国最大多数人民是不能团结，不知合作，缺乏道德陶冶，以及公民的训练。”<sup>③</sup>他们认为，中国因为具有此四大病症，缺乏生存上所必需的知识力、生产力、强健力和团结力，故一切建设，均无从谈起。

针对这四大问题，他们提出在人人取得最低限度的文字教育的基础上，实施四大教育，即以文艺教育培养知识力，以救农民之愚，以生计教育培养生产力，以救农民之穷，以卫生教育培养强健力，以救农民之弱，以公民教育培养团结力，以救农民之私。

文艺教育的意义，在于使人民能应用传达知识的工具，促进文化生活，并有能力去欣赏与了解自然环境和社会生活。用艺术方法增进科学知识，培养文艺的兴趣，充实文化生活。并以此种教育使中国民族自觉认识其过去的光辉，增强其自信心，而着眼于未来文化的创进，发扬民族的真正精神。

生计教育的意义，在于普及科学的知识与技术，改进生计组织，提高经济生活。一面增加农民的生产能力，一面训练合作能力，造成经济的合作制度，以解决其生计困难，应付经济压迫。

卫生教育的意义，在于普及卫生教育知识，养成卫生习惯，建设卫生环境，形成卫生生活，提高平民的强健力，以期能对多难的国家负起困苦艰难的责任。

公民教育的意义，在于养成农民的公共心与合作精神，发展团结组织力量，启发民族的自觉与自信，训练自卫自治能力，并养成法治的精神。

这四大教育的实施有三种方式，一为学校式，即普通的学校教育，以个人为对象，在一定时期里，施以系统的教育。二为社会式，以团体的共同教学为对象，以巡回讲演，社会服务指导，及其他直观与直感的教育方法为主，于社会的活动中施以教育。三为家庭式，是对家庭中各个分子不同的地位，由多数家庭中，联合起来，施以相当的训练，以家庭生活改良指导为方法，一方面使家庭社会化，另一方面使家庭中各分子皆不被教育所遗漏。

定县的平民教育的目标是通过识字、调查、示范、实验、合作等方式，探索问题，获得经验，他们企图以定县这个“研究室”为根据，从事实上研究实验以完成平教运动的整套学术，制订方案，再向全国推广，创造一条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出路。1930年7月，平教会提出了一个10年建设计划，拟将四大教育分三期实施。两年以后，他们发现农村的四大问题实际

① 平教会：《定县的实验》。

②③ 《乡村建设实验》第一辑。

上是互为因果的，故四项教育的推行也应该互相关联，不能独立进行。于是，1932年7月，平教会重新提出6年计划，将四项教育合为一体全面推进。并注意将实验工作与县政改革结合起来，经过几年的实际工作，他们发现进行乡村建设必须由农民教育、县政机关相互配合才能顺利进行。定县的教育科长、民政科长都是平教会的成员，县政府的施政计划与平教会的工作计划融为一体，自然易于推行。

总之，定县的工作试图在切合农民生活的大原则下，从农民生活里找问题，以四大教育连锁进行，以求其解决。教育与建设相互联合，在一个整体的积极改进生活中，以乡村人民的自觉行动为根本，找出一套科学化与制度化的办法，力求能够普遍推广。由于整个实验工作吸收了200多位包括博士、硕士在内的高级知识分子，把现代文化和科学技术带到了乡下，经过数年的经营，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其中平民教育效果最明显，1933年平民学校的高初两级毕业生达7644人，自1927年以来，毕业人数不下10万人（全县1930年人口普查共有38.4万人），该县减少文盲的工作在全国1900多个县中居领先地位。<sup>①</sup>在农业生产和卫生保健方面，引进和推广了一些诸如粮、棉、猪、鸡的优良品种，建起了实验农场，成立了消费合作社，建立了农村保健站和治疗点，注意防治村民的各种疾病，并宣传、推行了计划生育。

## （二）邹平的乡村建设实验

邹平县的乡村建设实验是由梁漱溟主持进行的。与定县的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不同的是，邹平的活动有其预先的系统而精致的理论指导，其乡村重建的实践是建立在“以乡村为本位”和“传统文化现代转化”的基础之上的。

据梁漱溟自己说，他的乡村建设理论“萌芽于民国十一年，大半决定于十五年冬，而成熟于十七年。”<sup>②</sup>与当时的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他的社会改革方案也是从社会问题引发的。“我的问题虽多，但归纳言之，不外人生问题与社会问题两类，……所谓中国社会问题是以中国政治问题为中心，我今日所提倡并实地从事之乡村建设运动，即是我对于中国政治问题的一种烦闷而得来之最后答案或结论。”<sup>③</sup>1918年，梁漱溟在《吾曹不出如苍生何》一文中列举了中国社会存在的种种问题，如国家的分裂、法律的废弛，战争直接破坏了战区的商业，并给农业、工业带来严重危害，外债急剧上升，农民在内外交困中过着潦倒的生活，以及社会风俗、道德的沦丧，学术交流的日益衰微，等等。他认为，中国社会存在的这些问题的原因是由于文化的失调，“自东西两个不同的文化相遇以后，中国文化相形见绌，老文化应付不了新环境，遂不得不改变自己学西洋以求应付西洋，但结果学西洋没有成功，反把自己的老文化破坏了。老文化破坏殆尽，而新文化未能建立，在此青黄不接前后无归的过度时期，遂陷入混乱状态。”<sup>④</sup>在他看来，近百年来中国民族的处处失败和动乱，是文化的失败造成的，而文化上的失败，是因为传统社会产生的文化弱点（他谓之幼稚、老衰、不落实、落于消极亦再没有前途、暧昧而不明爽——这五大病是由中国文化的“早熟”造成的）<sup>⑤</sup>应付不了近代以来世界交通的大环境，因此，百年以来到今天尚未解决的中国问题，实际上是形成于百年以前的中国社会之上。

① 杨雅彬：《中国社会学史》，第181页。

②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邹平乡村书店，1936年版，自序第2页。

③ 梁漱溟：《乡村建设论文集》，邹平乡村书店，1936年版，第14页。

④ 梁漱溟：《乡村建设大意》，邹平乡村书店，1936年版，第20页。

⑤ 参见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学林出版社，1987年版，第297—301页，第12章。

基于此，他主张，要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必须从积极的文化建设方面来进行。“乡村建设除了消极地救济乡村以外，更要紧地还是积极地创造文化，所谓乡村建设，就是要从中国文化里转变出一个新文化来。”<sup>①</sup>在另一个地方，他更进一步明确，“我们讲新就是建设新礼俗。所谓新礼俗，就是中国固有精神与西洋文化的长处二者为具体事实的沟通调和（完全沟通成一事实，事实出现我们叫它新礼俗）。不仅是理论上的沟通，要紧的是从根本上调和沟通成一事实。……当中国精神与西洋长处二者调和的事实有了时，就是一个新社会的实现，也是人类的一个新生活。”<sup>②</sup>只要把中西许多冲突的地方解决了以后，就能形成一个全新的社会组织，“这个组织乃是以伦理情谊为本原，以人生向上为目的。……它充分发挥了人类的精神（理性），充分容纳了西洋人的长处一是团体组织，此点矫正了我们的散漫；二是团体中的分子对团体生活为有力地参加，此点矫正了我们的被动；三是尊重个人，此点增进了以前个人的地位，完成个人的人格；四是财产社会化，此点增进了社会关系。”<sup>③</sup>

这种建设新社会的方案，单靠纸上谈兵无法实现，在混乱的中国也无法从上而下组织实施，只有由下而上，从乡村一点一滴做起，由乡村开端倪，然后推广到全国，才能实现。

梁漱溟认为，建立新的社会组织，必须靠乡村建设运动，“中国是一个以乡村为本的社会，百分之十以上的人口住在乡村，过着乡村生活，中国的命运是寄托在乡村，寄托在农业。”<sup>④</sup>“中国文化是以乡村为本，以乡村为重，所以中国文化的根就是乡村。”<sup>⑤</sup>因此，“中国问题的解决，其发劲以至于完成，全在其社会中知识分子与乡村居民，打开在一起所构成之一力量。”<sup>⑥</sup>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的实践活动，经历了三个时期，1928年在广州办“乡治讲习所”，1930年在河南辉县与彭禹廷、梁仲华等人办河南村治学院，1931—1937年在山东邹平办乡村建设研究院，在邹平，历时7年的乡村建设实验把全国乡建运动推向了高峰。

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分为三部分，另外还有一个附属农场及其他附属机构。第一部分是乡村建设研究部，任务是研究乡村建设理论，招收大专院校的毕业生，每次招收四、五十人学习一年。第二部分是乡村服务训练部，任务是训练乡村服务的工作人员，招收高初中毕业生或同等学力者，每次招收300人左右，毕业后回各县担任乡村建设的骨干。第三部分是乡村建设实验区，以邹平全县为实验区，县政府隶属研究院，县长由研究院提名，省政府任命。以后又增设菏泽、济宁为实验县。

邹平的整个工作，是采用行政机关教育化的制度，依据丹麦“始终以人生问题为中心”的教育模式，通过建立乡学、村学，吸收全部乡村的人做学众，启发农民的自觉性。

乡学、村学是新社会组织的形式。梁漱溟认为，借助于乡学村学，可以完成下面的任务：（1）保持了伦理情谊和人生向上的中国民族精神，他认为是北宋吕和叔的“乡约”启发了他的灵感，其“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的人际关系刚好是中国理性深层结构的表现。（2）克服了乡村社会一盘散沙的局面，将农民组织起来，把共同困难的问题拿出来，让他们认识到自己共同的不幸，促使他们自觉地共同合力来解决，即是

① 梁漱溟：《乡村建设大意》，第25页。

②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第143页。

③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第175—176页。

④ 梁漱溟：《乡村建设大意》，第12—14页。

⑤ 同上，第21页。

⑥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第344页。

说乡农学校可以使农民生发自觉和合作的要求。(3)在此基础上,大家遇事共同商量,合力解决面临的天旱、地疫、粮贱、捐重、烟赌等社会问题,在这种自治氛围中慢慢发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4)也是最重要的,即是通过教员这些新知识的传播者,把先进的科学技术如良种、机械、农药等带到农村。这样,通过乡农学校,就能实现经济上的生产与分配的社会化,为消费而生产,从农业引发工业,组织生产合作社,以及教育民众,推广识字运动,整顿不良风俗,引导大家关心社区问题,参与社区生活。实际上,乡农学校在兴办教育、开发民智,促兴农业、发展经济,风俗改良和卫生习惯的养成,提高办事效率方面,确实做出了相当可观的成绩。<sup>①</sup>

### (三) 江苏的乡村教育工作

与北方定县、邹平相呼应的是江苏省的乡村教育与乡村建设实验。它们由中华职业教育社、中华教育改进社和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分别主持推行。

中华职业教育社是由黄炎培、江恒源、赵叔遇等人发起的。1926年冬天,中华职业教育社在江苏昆山徐公桥以乡为单位设立乡村改进试验区,1928年又在该地成立乡村改进会以促成徐公桥的乡村自治,1934年扩大以昆山县为自治实验区。中华职教社认为,农村教育决不能脱离农业而独立,如果不全力改进一个新的环境,则教育就无从实施。如果农村经济没有改进,农村生产没有增加,则教育不易进步。同时非农村组织健全,有自治能力,则农村建设事业也就不能保持长久。因此,他们致力于农村事业,努力使中国农民由“无业者有业”,“有业者乐业”。以教育为一切农村改进事业的中心,从经济方面做起,而以农村自治为终结,实施之际,对于教育事业的推进,以政治经济为辅;对于政治事业的改革,则以教育经济为辅;对于经济事业的发展,则以教育政治为辅。教育、政治、经济三管齐下,以达到农村发展生长、壮大的目的。

1927年,中华教育改进社在南京设立了乡村师范学校,即著名的“晓庄师范”。其宗旨是以教育推进和改造乡村的生活。他们在《改造全国农村教育宣言》中宣称:“征集一百万同志,促办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实行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和教学合一的办学方针,强调教学与实际工作的结合。为保证学校办在社会里,学校一方面与地方机关单位如水利、卫生、工厂等相配合,一面自己设立社会事业单位如中心茶园、巡回剧团、民众学校、展览会等,用以密切与社会的关系。

设在江苏无锡的江苏民众教育学院,后改称江苏教育学院,是俞庆棠、高践四等人于1928年成立的。其设立的主旨在培养江苏61县的民众教育与农事教育的服务人才,它与普通的教育学院,性质不同。俞庆棠曾留学美国,专攻成人教育(又称民众教育、社会教育),其教育的对象是正在从事社会生产活动的成年人,他们的学习在工作之余进行。教育学院以民众教育为手段,以乡村建设为目的。他们认为民众教育不走向乡村建设的目的去,则会流为空泛无用。而乡村建设不取道于民众教育,一切也无从下手。因此,他们认为:“救济农村的衰落,应以民众教育为动力,农村建设是实施民众教育的目的,民众教育是完成农村建设的方法。”<sup>②</sup>民众教育所以能成为乡村建设之路,即因它是一种工具,可以启发民众,引出问题,能使民众有组织,有力量,能自觉自动的起来谋求所以求解决问题之路。教育学院分为三部分,总务部总理事务,教务部主持人才训练及有关教务事项,研究实验部研究各种

<sup>①</sup> 参见《全国乡村建设运动概况》一书。

<sup>②</sup> 《研究实验中心问题》,江苏教育学院编。

实验计划,主持各部实验工作。

1932年,教育学院设立北夏普及民众教育实验区,希望借着教育的力量,组织民众,建设乡村。他们在实验区内设立了民众实验学校、乡村小学、民众学校、合作社员训练班以及乡村建设讲习会等,教育内容涉及了自卫、自治、识字,推广农业改良,提倡合作组织,举办健康指导等等,并企图在此基础上,实现一个政教合一的社会组织。

以上所述是10年乡村建设运动的几个主要方面,我们从中不难看出乡建运动当时的潮流趋势。从事乡村建设的知识分子,为了相互沟通,取长补短,还举办过三次全国规模的乡村工作讨论会。第一次讨论会于1933年7月在邹平召开,到会者70余人,代表35个团体;第二次于1934年10月在定县举行,到会者150余人,代表76个团体,分属11省;第三次于1935年10月在无锡举行,到会者169人,代表104个团体,分属18省。<sup>①</sup>会议的规模一次比一次大,参加的人数一次比一次多。

值得一提的是,俞庆棠在创办江苏教育学院之后,又于1933年发起成立了社会教育社。这是一个从事社会教育工作的人自愿参加的学术性的民间组织。社会教育社把很多从事乡村工作的知识分子吸引到自己周围,互相切磋经验,起到了协调发展的作用。社会教育社的三位负责人是俞庆棠、梁漱溟、赵安霞。

由于日本军国主义的入侵,也由于乡村工作的改良性质所导致的自身难以舒解的困难,整个活动基本上于1937年后半年停顿下来,10年成果也被炮火毁于一旦。

## 二、乡村建设的社会背景与理论根源

10年乡村建设运动,众多的知识分子,从各种不同的立场,抱有不同的目的,运用不同的方法,集中到农村改良方面来,这自然不是偶然的事情,其中包含有深刻的经济、政治、文化背景,它是一部分爱国、正直、自由的知识分子基于中国当下的社会现实和对民族文化及世界文化未来方向的体认,对民族现代化道路的选择。

梁漱溟在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上演讲“乡村建设的旨趣”时曾说:“四面八方的来到一块,这证明今日乡村运动好象是天安排下的,非出偶然。它(指乡村建设——笔者)是从两面来的:一面从中国历史演下来,一面从西洋历史演下来,二者相遇,发生近百年来的中国问题。从中国问题产生数十年的民族自救运动,辗转变化,而到最后这一着(乡村建设这一着)。此其故亦都容易明白,用简单的两句话来说:就是中国原为乡村国家,以乡村为根基,以乡村为主体,发展蔚成高度的乡村文明;而近代西洋文明来了,逼着它往资本主义工商业路上走,假如走上去也就完了,没有我们的乡村建设了。无奈历史命运不如此,十年来除乡村破坏外没有都市的兴起,只见固有农业衰残而卒不见新工商业之发达。我们今日的苦痛正在此,然而未来的幸运也在此。盖从大势上反逼着我们走一条不同的路……这一条不同的路,便是从农村引发工业,以乡村为本而繁荣都市,这是中国今后一定的路线。新社会的创成在此,中国的得救在此。中国之得救是要新社会文明的创成而得救的,我们只有向着创造新文明去努力才可以救中国,此殆为历史命运所决定。没看清大势的人嚷着救济乡村,乡村自救,而不知其为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一着;或知其为最后的民族自救运动,而不知其恰

<sup>①</sup> 《中国农村论文选》上,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71—272页。

已肩负着创造新文明的使命。”<sup>①</sup>这一番大有“普天下舍我其谁”的自负言语，道出了部分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悲凉心景和“以天为己任”的共同心态。也明确地向我们透示了乡村建设运动的社会背景。

以农业文明为基础的中国民族，当她斯文地迈着方步走向近代的时候，突然遇到了以火与血开路的西方文明的严峻挑战。这种挑战是整体性的。中国被迫纳入了世界性的现代化潮流中去。外国资本的侵略，民族主权的丧失，历史进程的急剧转型，都使中国出现了一些问题。

(一) 经济方面。自近代以来，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他们挟其优势的工业品冲垮了中国的乡土工业，动摇了中国的社会基础。加上自民国初年以来，几乎连年的灾荒和军阀的盘据战乱，使整个社会一片混乱。中国农村在内外矛盾的夹击下，在慢性破产的基础上，长期地沉沦于恐慌的深渊，农民购买力极度减少，乡村资本急剧流入城市，加重了整个社会的危机。这种危机到了“九·一八”之后，更加空前的紧张。在这种情况下，人们重新把眼光转到中国的社会基础方面，企图复兴中国农业，以挽救民主的经济危机。这样，“外国侵略虽为患，自身有力量可以御外也，民穷财尽虽可忧，使有秩序则社会生活顺利进行，生养长息不难日有起功也。”<sup>②</sup>

乡村运动者正确地把握了中国的基础在农村，因此，他们都注意倡导知识下乡，从而改造农民素质，改良农业技术，提高农民收入，重建社会的微观经济基础。

(二) 政治方面。在西方文明狂飙般的侵袭下，也使中国政治得到了回应：1865年清政府创办第一所具有近代技术的江南制造局，1898年的新法要求学习西方民主，1905年废除科举，1911年推翻满清建立共和……。然而，道路并不顺利，自强新政的洋务措施，在开矿、练军，举办工业方面积累了33年的成绩，经不住甲午海战的一次考验。康、梁、谭等人的维新，更是在残酷的现实面前败下阵来。辛亥革命推翻了专制，却重新开始了专制中的混乱。定县平教会的平民文学部主任孙伏园认为，自鸦片战争以来，为着挽救垂亡的国运，曾发生过六次政治运动，即太平天国、戊戌新政、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1926年的国民革命，“以上这五次运动，其目的都在挽救鸦片战争以来垂亡的国运，论范围是一次比一次的扩大，论意义是一次比一次的深沉，论对于挽救危亡的目的是一次比一次的接近。”但是“危亡的症象也一天比一天的增加和暴露”。<sup>③</sup>对社会体制的更化曾寄于过高期望的知识分子，在经历了辛亥、民初的政治沦丧之后，突然发现他们应当去做的，是更迫切的整个国民的精神的工作：让国民自主地掌握社会发展的方向，培养他们的新政治习惯。正如梁漱溟所说，以前中国的政治运动之所以失败，乃是由于只注意于上而不求统一于下，中国的政治制度的改造，需要从基础做起，打好基础。“国家宪政要以地方自治为基础，从基础做起，就是从最基层开始做，搞乡村的自治，一村一乡的自治搞好了，宪政的基础也就有了。”<sup>④</sup>在他们看来，从乡村做起，慢慢培养中国农民的新政治习惯就可以建立起民主政治的基础，这种思想，或多或少地受了孙中山“将政权归于平民”主张的影响，而当时流行的看法，平民主义应以推进平民的能力与知识为本，因此，他们主张社会与政治改革应从乡村建设入手。

我们可以看出，乡村建设运动的勃兴，是有着深刻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原因的，其

① 参见《乡村建设论文集》。

② 引自《中国农村论文选》，第265页。

③ 《民间》半月刊创刊号。

④ 梁漱溟：《忆往谈旧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117页。

中农村的破败和建立新政治制度的憧憬是导致许多知识分子离开都市,走向民间的主要原因。

乡村建设运动,在当时也有着一定的理论根源。

### (一) 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影响:

中国历来有重视人民力量的传统。关于民犹如水,能载船亦能覆舟的记载史不绝书。“民为邦本,民强邦固”是定县晏阳初乡村建设的哲学基础。邹平梁漱溟也认为进行任何工作,若没有大多数的人民参加,是不能成功的。我国基于民本思想的从宋代开始的“吕氏乡约”直接影响了乡村运动的组织机构。“吕氏乡约”是北宋吕和叔于1076年在陕西兰田县推行的,它是一种邻里乡党之间互相要求、监督的书面承诺。内容分“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四部分,后经南宋理学家朱熹加以修改,推行于全国。明朝王守仁也曾订有南赣乡约,实行移风易俗。明代末期理学家陆世仪著有“乡治三约”,以乡约为纲,以社学、保甲、社仓三者为目,实行区域性的地方自治。乡村工作者受其启发,认为古代“乡约”实际上就是现代的“地方自治组织”,乡村建设合于乡村居民自动、自发、自为的原则,并符合将教育、政治、经济的工作内容融于一体的做法。

### (二) 西方平民教育思想和社区发展理论的影响:

随着西方工业化的发展,要求乡村居民不断适应正在飞速发展的机器生产的需要,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和工作能力,因此,从实际中产生了平民教育思想。其中丹麦的民众教育最为成功。我国一些平民教育家曾留学欧美,对西方的平民教育思想比较熟悉。俞庆棠女士留学美国学的就是平民教育专业,从理论到实践都受过严格的专业训练。梁漱溟虽没有负籍欧美,却对丹麦平民教育最为详熟,对丹麦教育中的人生行道、人生自觉、互相合作、学做合一以及爱国心的培养等内容有正确的把握。<sup>①</sup>因此主张将“组织起来”和“人生向上”做为中国乡村工作的方向。

在本世纪的二、三十年代,现代社会学的关于社会发展、社区工作理论,经由近百年的努力,已臻完善。当时的社区发展理论认为,落后社区的社会开发,应以科学的社会调查与实地研究为基础,采取社会各方面协调发展的整合计划,自下而上地推行,他们强调社区人民的主动参与和其素质的提高。这些理论直接影响到了乡村建设运动的措施。晏阳初强调社区人的问题,梁漱溟的户籍调查、农民自觉和团体组织双管齐下的做法,俞庆棠、陶行知的教育在于改造生活的宗旨,实际上是社会发展理论在中国的发展和运用。

另外,乡村建设运动也明显地受到了美国乡村生活运动的影响。美国乡村生活运动是谋求农村生活的改良而兴起的一种农村生活研究与建设的运动。本世纪初年,因为受到了工业革命和城市发展的影响,许多美国农村中发生了各种社会问题,如农业生产减产,农民生活贫乏,教育水准下降,青少年大批离乡等等,乡村呈现出全面解体衰败的现象。当时的罗斯福总统,鉴于这种危机情况,于1908年组织了一个美国乡村生活委员会,由七名对乡村生活有研究的学者为委员,对农村进行调查,1911年写出报告。这样,乡村生活与建设的运动逐渐引起各方注意。1912年美国社会学年会,即以乡村生活的研究为主题。从此,与美国农业推广、乡村教育、农村经济学与农村社会学相互联系在一起的活动就繁荣起来。中国的一些乡建巨头如晏阳初、陶行知、俞庆棠、李景汉、高践四等人,在思想和做法上受到美国这一运动的影响,借鉴了他们的一些做法。

<sup>①</sup> 参见《丹麦的教育与我们的教育》,《梁漱溟教育文集》,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 三、乡村建设运动对中国和世界的影响

由知识分子发其端的乡村建设运动，在当时就引起了中国共产党人、南京国民党政府和一些西方人士的关注。

#### (一) 对中国的影响：

20年代后半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正处于低潮，但仍关注着知识分子的农村改良活动，他们批评乡村建设运动企图在现存制度下，用和平的方法达到国家改革的理想，是用幻想代替严酷的现实。并指出中国面临的社会总体问题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及代理人的压迫，只有用暴力革命改变既存的社会关系，才能实现国家富强的目标。而对那些抱着爱国热情投身农村工作的青年知识分子，则是给予热情支持，并努力争取他们走到革命的道路上来。

乡村工作者对农村的改良，对农业科学技术的改进，客观上符合了国民党政权的利益。他们放宽了对乡村工作者实验的限制。1932年12月，第二次全国内政会议，有在各省设立县政实验区及县政建设、研究院的决议，并采用“政、教、富、卫”合一的精神，改革县政。抗战爆发后，晏阳初又在重庆马歇场成立了乡村建设学院，并设定实验县，在继承10年乡建工作优点的基础上，进行学术和实践结合的县政改革。它强调行政的学术化，学术的实际化，试图用学术刷新中国的政治，实现民主共和的理想。

乡村建设对平民教育的强调，影响到了当时的南京政府。1928年5月国民党政府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上，就有设立乡村师范学校与训练乡村教育师资的议案。1930年4月全国第二次教育会议，又提出了实施义务教育的初步计划，并规定在5年内健全全国乡村师资培训机构，同时决定开办城市和乡村义务教育实验区1500处，预定在1931年底，全国实施四年义务教育。可见定县、江苏等地的民众教育实验对全国民众教育政策及发展均具有推动的作用。

#### (二) 对国际的影响：<sup>①</sup>

中国的乡村建设工作刚开始，就引起了外国人士的注意。美国学者甘伯尔（Sidney D. Gamble）曾亲自参与河北定县的实地调查研究工作，并写成《定县——一个中国北部的乡村社区》一书，对定县的实际生活状况和平教会在定县的工作方法进行了详细介绍。1945年3月，美国女作家塞珍珠（Pearl S. Buck）通过对定县的考察后，出版《告语人民》一书，向全世界介绍了中国定县平民教育运动，并强调了它在世界范围内的意义。她指出，目前世界上有四分之三的人民正处于文盲、疾病、饥饿与残暴政治的统治之下，如不能使占人类绝大多数的普通人民接受教育，获得最低生活水准，则人类的幸福、和平、繁荣就没有保障。因此，她认为定县的平民教育运动不仅可以推行于中国，也可以推行于世界，尤其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乡村社区。此书出版之际，正值联合国的有关会议在美国旧金山举行，各国的政府领导为战后的复兴计划寻找对策，中国乡村建设工作的经验可以为世界各国提供一种把战后的贫穷社会予以救济的新观念。1945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举行会议，中国代表翟世英根据定县平民教育的工作经验，向大会提出了报告，介绍了中国的做法。1952年晏阳初由国际平民教育运动委员会的介绍，前往菲律宾介绍中国定县乡村建设的经验，并长期居住菲律宾，帮助推行乡村建设。1961年7月，晏氏应邀赴拉丁美洲及非洲各地讲述乡

<sup>①</sup> 本部分的写作借用了台湾东吴大学社会学教授徐震先生的有关材料，参阅《中华民国历史与文化讨论集》第四册，台湾正中书局，1984年版，第374—376页。

村建设的经验，引起反响和实际行动。一直到1973年，美国学者哈福特（Charles W. Hayford）以“中国的乡村建设”为题，撰写了哈佛大学的博士论文，对我国的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作了学术性探讨。1979年世界展望会国际总会在非洲开会，该会主持人专门介绍了晏阳初在中国和菲律宾的农村建设工作的理论与方法。可见定县的经验已在世界许多地区流传和接受。

关于邹平的乡村建设实验，日本学者菊田太郎（Kikata Taro）曾于1941年发表《梁漱溟的村治论》，小野川秀美（Onogana Hidemi）于1948年发表《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的成立》一文，分别对梁漱溟在邹平进行的乡村工作的理论、方法及实际工作做了介绍和评论。美国学者拉穆利（Harry J. Lamley）发表《梁漱溟，乡村建设与乡村工作讨论会》，对中国乡建10年的工作计划，作了详细整理。现任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的美国学者艾恺（Guy S. Alitto）在他那本发表于1979年并荣获美国“东方著作奖”的《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困境》中，对邹平的社会重建的实验，辟专门章节进行了研究。使邹平的工作得以介绍到世界各地，对战后各国的社会重建和改组的构想，特别是落后地区乡村的建设与改造，起到了参考性作用。

1949年，我国社会工作专家张鸿钧应邀参加联合国工作，先后任社会局研究主任、中东地区社会发展办事处主任、联合国亚经会社区发展顾问等职，负责亚太地区各国社区发展的训练和规划工作。张氏在我国乡村建设运动期间，任燕京大学社会工作教授兼山东汶上实验县县长，是我国推行和实际参与乡村工作的领袖之一。他以实际工作经验，参与有关联合国的会议、规划与决策，使中国乡村工作的有效经验，得以在决策层次上推行于世界。

#### 四、乡村建设运动的现代启示

前已论及，乡村建设运动是企图在保存现有社会关系的前提下，用改良的方法，实现社会现代化的理想。由于中国二、三十年代，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空前激烈，致使当时不存在社会改良的条件，因而使整个乡村重建的工作最终不可能顺利进行。

乡村建设运动开始之初，就遭受了或平和或尖锐的批评。比较有代表性的批评是，城市救国论者吴景超，全盘西化论者陈序经，社会学理论家孙本文，及以孙冶方、千家驹、李紫翔为代表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对乡建改良的批评。其中，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比较全面系统地从中国社会政治历史的发展，分析了产生农村改良主义运动的背景，并指出在当时社会条件下，用和平的方法进行社会改组是行不通的。他们公开批判了乡村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方面的错误。第一，中国的国民经济，无论从与其各国的关系上，或其自身的结构上，都已成为世界经济的一个环节，在整个民族陷入沦亡危机的时候，中国经济的复兴与政治的解放是不可分割的一个事实的两个方面。因此，中国的乡村建设不能离开民主解放运动而单独进行。第二，中国的问题，是整体性的，想由“农业引发工业”，或以农村复兴振兴都市，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问题。第三，农村或农业问题，实包含有生产手段的分配，生产物的分配，农业经营和农村金融等问题。乡村运动者忽视生产手段和生产物分配的问题，尤其是土地分配问题，仅从农业技术、农业改良、农产品运销、流通金融等枝节问题上下功夫，不可能从根本上解除农民的痛苦。第四，乡村工作者在当时社会条件下所做的恢复农业的事情，客观上有利于既存社会制度的维持和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当时兰溪实验县的工作报告验证

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的结论。兰溪县的乡村工作者指出他们遇到的困难：“第一，手工业无论如何提倡，总敌不了外来货物的倾销，则手工业还有什么前途？第二，外来农产品倾销到农村，有什么办法可以把洋米洋面赶出去？如果赶不出去，则改良农业生产，增加收获，岂非更将使农产品价格跌落，农民愈不能维持。对此有何法救济？第三，特殊原料之输出，不能一般通行于各县，而且可因在外之竞争而被阻，此事并非根本恢复经济的方法。第四，农民贷款，如果从理论上讲，土产农产品价格必自然的日渐低落，仓库抵押必有不能实行之一日，否则银行有亏本之虞。这些困难，……第一、第二两点，非地方力量所能办，有待于省与中央，第三、第四，只能做到局部，然而中央与省两方面又都认地方县政，才是抵御外来经济侵略的政治细胞……。如何能解决外来经济侵略问题，正是中国政治是否有前途的唯一关键。”<sup>①</sup> 兰溪实验县的例证，说明了农村改良并不能够解除经济的危难，亦不能抵御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

乡村工作者在实际工作中也遇到了一系列困难，诚如乡建巨头俞庆棠所说：“目下乡村工作中的保卫事业，保得住一村一乡或一县少数人的生命财产，却挡不住黄河长江的怒潮，更保不了整个国土的完整。……乡村工作中的生计设施，可以增加几个乡村或几个县份的收入，却抵不住国际经济侵略的深入农村，也不能使农产品的价格不低落，从事生产的资源不枯竭。……从事于乡村工作者，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使每亩农作物的田地，增加半担以上的收获，这是了不起的成绩了。如果一旦洋米倾销，或麦棉大量进口，每担作物的价格，立刻可以跌到原有价格的半数。”<sup>②</sup> 由于改良者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业已集聚严重的土地问题，因此，他们就找不到现实的力量来支持这个运动。1983年深秋，笔者随山东大学调查组前往拜访梁漱溟时，这位一生抱有救国宏愿的世纪老人还对当年知识分子空有救国之心却不能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而导致“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高谈社会改良而依附政府”的结局感叹不已。

尽管如此，乡村建设运动在当时仍有其积极的意义。（一）发现了中国社会的真实性。他们的工作避免了以前历次运动对农村的忽视，否定了拿少数都市社会来代表真正中国的见解，他们一致指出，中国真正的社会是那占全国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人口分散居住着的广漠的乡村。要解决这样一个乡村社会的问题，天然不能忽略了或弃置了他们本身。乡村工作者深入农村所搞的调查研究，如李景汉先生对定县土地分配与农作物种类的调查，邹平对户籍和农村人口的调查，不仅发现了新的社会事实，向全国各界介绍了中国农村的现状，而且保存了珍贵的历史资料。（二）发现了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力量是在基层。他们认为，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是使这个社会本身生发出力量来，要培养社会发展的动力，必须从潜伏在广漠的乡村的农民做起。乡村工作者深入到真正的社会里去，做艰苦的自动与自觉的启发工作，指出社会基层组织的重要，在某种意义上抓住了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

乡村建设运动惨淡经营10年，终因整个活动的改良倾向与时代生命的脱序而归于失败，当时曾叱咤一时的人物也大都消失于默默的历史长河之中。然而，在选择民族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中，整个两代知识分子的奋斗是发乎心灵的。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时空置换，它以悲剧色彩所留下的启迪还是能引起人们深深的思考。从一个大的历史跨度看，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仍

<sup>①</sup> 参见《中国农村论文选》，上第267页。

<sup>②</sup> 参见《中国农村论文选》，上第273页。

在进行中，农村和农业，仍然是国家的基层和基础，在今天深化农村改革的过程中，有机会总结乡村建设运动的经验教训，我们发现，当年的一些理论和措施，仍有着方法论上的启发作用。

(一) 注重民为邦本，发挥村民自身的作用。“民为邦本”是中国的固有哲学，乡村建设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发现了农民力量在中国社会中有特殊作用，并努力培养他们的自治能力。晏阳初曾深刻地指出：“现在国家所以弄到如此地步，主要的原因，就是忘本，……我们要救亡图存，必先认清症结所在。过去的政治经济文化之所以落后，就是因为设施没有着眼于民众，民众伟大的力量，非但从来没有运用过，而且根本没有发现过。所以乡村建设运动的目标，在发现组织和训练民众伟大的力量。”<sup>①</sup>

乡村工作者都强调启发民众自身的力量。晏阳初认为，挽救农村的破产，不应该用救济的办法，而是协助他们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所以他强调“不是救济，而是发挥”。梁漱溟也认为工作的重点要放在启发“人生向上”上，倡导社区居民对社区生活为“有力的参加”和“商量着办事”。

这种观点符合联合国发展署关于社区发展的经典定义，即社会工作者和政府引导和配合社区居民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善自己的社会环境和生存环境。乡村工作者50年前的方法，在今天我们正在进行的社会救济和社会保障工作，对我国某些落后社区的开发，仍有着现实的启发作用。

(二) 在现代化过程中，面对中外文化的冲撞、融合，既注意吸收西方文化的长处，又注意本民族文化的特长及对外来文化的接受方式。定县和江苏的乡村教育工作，都明显地受到西方教育思想的影响，但他们在实验中，在工作的开展上，注意将实践的内容与作法符合中国国情，提供一个既合于西方科学方法，又能被我国农民所接受的教育模式。梁漱溟的社会实验，更多地注意了民族传统的重建问题。他比较注重维护和发展中国固有的传统，注重中国社会自身的特点，并把它作为建设新社会，开创新事业的重要依据。梁氏的关于中国的现代化是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的思想，在今天仍有着方法论上的意义。

(三) 解决乡村问题的整体性观点。定县、邹平、无锡等地的乡村工作，都有着详尽而严格的计划，如定县解决愚贫弱私四大问题的6年方案，江苏北夏实验区的平民教育步骤等。在工作方法上，定县的教育采用了家庭式、学校式、社会式相结合形式，邹平则采取把“农民自觉”和“乡村组织”的双重目标通过乡农学校的形式一同实施的措施，这种整体性、全盘考虑的方法，也值得今天从事社区工作的同志借鉴。

(四) 知识分子深入实际，走入民间，与广大人民联合起来谋复兴之路的精神。梁漱溟指出：“乡村问题的解决，第一固然要以乡下人为主力，第二亦要有学问、有眼光、有新知识的人与他合起来。”<sup>②</sup>他认为中国社会问题的解决，中国新社会制度的建立全靠知识分子下乡，与乡村居民联合起来才能完成。在他及同仁的倡导下，许多知识分子换上布底老鞋，从都市来到闭塞的乡下，做艰苦的民族自救的工作，其精神是极为可嘉的，当时就受到了学界的普遍称赞。

知识下乡，始终是中国社会现代化中的一个大问题。这在今天，仍有着迫切的现实意义。在农村改革逐步深入的新形势下，随着产业结构、多种经营的不断发展，农民对教育、科技

<sup>①</sup> 《中国农村论文选》上，第301页。

<sup>②</sup> 梁漱溟：《乡村建设大意》，第152页。

不断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科教兴农的呼声已不绝于耳。据研究，我国30年来农村依靠科学技术所提高的生产力极为有限。因此，科技下乡，是加速农村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但直到目前，知识分子大规模下乡的迹象还没有出现。在这方面，30年代前辈学人的牺牲精神是值得提倡的。

作者工作单位：山东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陈庆利

---

## 我国社会学界的老朋友日本著名社会学家 福武直逝世

---

我国社会学界的老朋友、战后日本代表性社会学家、东京大学名誉教授福武直先生因心肌梗塞发作，于1989年7月2日晨在东京不幸逝世，终年72岁。

福武直先生是日本冈山县人，1940年3月毕业于东京帝大文学部社会学科，在学习研究生课程和担任助教期间参与中国农村调查。战后，为加速农村改革与废除家族制度，推动日本社会民主化进程，致力于日本农村社会性质的调查研究。1948年任副教授，1960年任教授。1963年，他的论著《世界农村之旅》获每日出版文化奖。1981年退休后至1986年任社会保障研究所所长，将社会学理论运用到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研究领域。他还担任了厚生省中央社会福利审议会委员长、总务厅老人问题恳谈会会长、全国大学生生活协同组合联合会会长等职务。

福武直先生的研究领域广泛，主要包括：①社会学理论与社会调查方法研究；②日本、中国、印度农村与社区的实证研究；③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研究及对策等。主要著作有《中国农村社会结构》、《日本农村社会性质》、《现代日本社会论》等。他的实证研究方法主导了战后日本社会学的发展方向。

福武直先生对中国充满了友好之情。他对中国苏州郊外农村的调查是他毕生农村社会研究的起点。1979年中国社会学恢复以后，他以极大的热情关注我国社会学的重建与发展，于1980年9月亲自发起成立了“日中社会学会”，积极开展学术交流。1983年至今，他分三次将私人珍藏的4033册社会学书刊捐赠给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提供了丰富、珍贵的资料，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社会学的发展。今年3月，在中国社会学恢复十周年之际，应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的邀请，福武直先生作为日中社会学会第三次访华团顾问来华访问，为“福武直文库”剪彩，并接受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社会学系“名誉教授”称号。

福武直先生渊博的学识和淳朴的作风赢得了中国社会学工作者由衷的敬意。他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可亲可敬的益友，我们为之无限惋惜和悲痛。

（李国庆）